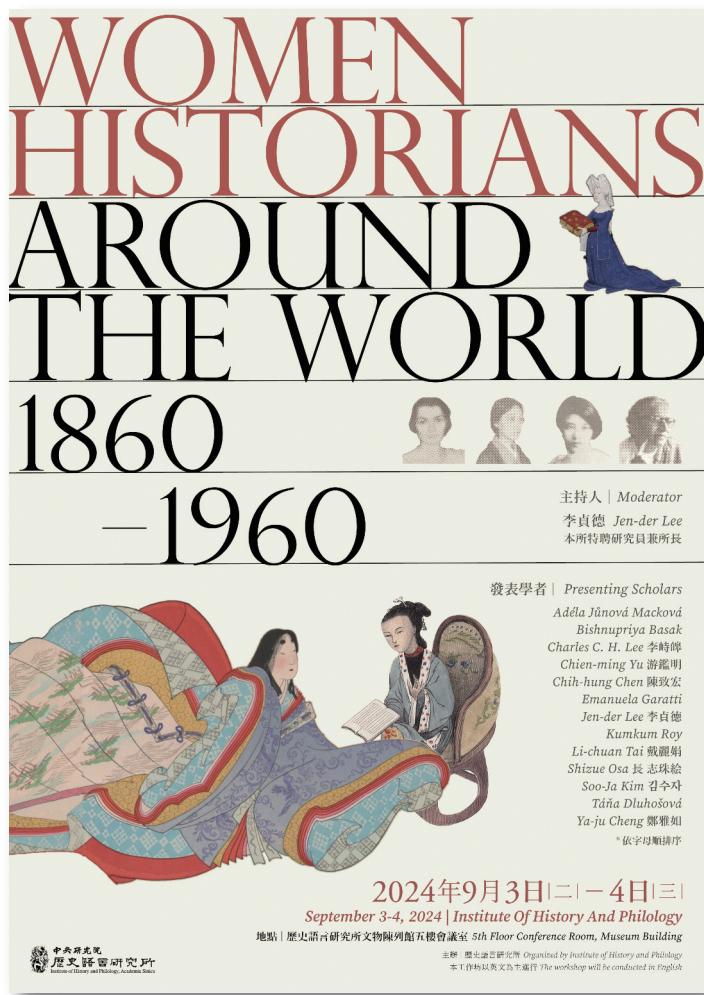


# 女史家研究— 五十年來英文學界的成果和啟發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45 期 2025.12

## 一、前言

女性和歷史書寫的關係淵遠流長。希臘神話視 Clio 女神為史學繆思，歷代皆有崇拜者。號稱歐洲第一位女性主義史家的 Christine de Pisan (1364-1431)，為了替自己打氣，也為後繼者加油，透過其名著《女性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1405) 介紹歷史上和神話中諸多女性的貢獻和影響，其中不乏善書能文的智識女性。**①** 中國古代史上最著名的女史家或非班昭 (49-120) 莫屬，她不僅受東漢和帝之詔入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八表和天文志，並擔任皇后嬪妃的導師，在和熹鄧太后 (81-121) 臨朝聽政期間，更是太后思考決策時的重要顧問。**②** 班昭又曾補注劉向《列女傳》，後世亦有效法踵繼者，乃至為十八世紀論者尊為婦學楷模。**③** 東西歷史上參與寫史的女性不一而足，但學者大多放在藝文才女或道德典範的脈絡下考察。**④** 至於分析她們與近代專業歷史學科之間或延續或斷裂之關係者，除了北美學界成績亮眼之外，其他地區的討論仍頗罕見。究其緣由，實因近代專業女史家的研究仍待開發之故。

近代學科領域建置過程中，知識女性遭篩汰者衆，跨入學院門檻者寡，不同學科接納女性的進度不一。**⑤** 科學史研究顯示有些學科自始即明文排除女性，有些學科雖並未明文禁止，卻因教研方式或培訓環境造成女性難以加入，或加入之後難以為繼。**⑥** 晚近不少人文社會學科回顧自身發展時，會針對性別化和去性別化的歷程進行檢討，或致力於挖掘過去遭到忽視的女性前輩，或彙整學史文獻供後來者精進。**⑦** 歷

\* 本文初稿部分內容曾以英文宣讀於史語所“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工作坊（2024年9月3-4日），感謝評論人秦曼儀教授和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今大幅增修並改寫為中文發表，幸蒙《古今論衡》匿名審查人賜教並糾謬。撰文與修訂期間，曾賴蔡宛蓉小姐、林靄融和王安珩兩位同學協助收集資料，謹此一併致謝。

**①** Christine de Pisan (1364-1431),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first published, 1405; New York: Persea Books, 1998). 對中文世界的啟發，見李貞德，〈傑出女性、性別與歷史研究〉，收入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臺北：心理出版社，1999），下冊（性別與文化、再現），頁1-16。

**②** 班昭家世生平，見范曄 (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八四，頁2784-2792，其中續完《漢書》(82)事，見頁2784-2785，建議鄧太后放行兄長丁母憂事，見頁2785。

**③** 宋人稱班昭補注劉向 (77-6 B.C.)《列女傳》，近人則為之論證，見朱曉海，〈劉向《列女傳》文獻學課題述補〉，《臺大中文學報》24 (2006) : 49-82。章學誠 (1738-1801) 論〈婦學〉，以班昭為古典楷模，藉以評論當時才女藝文之風，討論見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4, “Writing,” pp. 76-120.

**④** 近半世紀以來才女研究成果豐碩，英文學界關於傳統中國才女研究之史料與分析，見 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文方面的綜合評述，參胡曉真，〈文學與性別——明清婦女文學〉，收入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9），頁333-375。餘見下討論。

**⑤** Evelyn Fox Keller,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83), “A Historical Overview,” pp. 1-14. 其中提及二十世紀上半同屬生物領域中的不同科系，對接納女生入學的態度不一。

**⑥** 一項最新研究從出版情形比較，認為今日男女的學術生涯仍有落差，“Who’s quitting academia?”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0021-6> (2025.01.20 查詢)。

**⑦** 社會學可能是人文社會領域中較早反省此題的學科，不僅自上世紀末即有數本專著介紹學科建立初期的女

史學界的反思亦不遑多讓，1970 年代學者便已發文，考察百多年來美國女性參與寫史的脈絡及其成績；❸也有縱覽數世紀，上溯中古以來歐洲女性寫史之動機、特色與影響者。❹數十年來，針對此題發表踴躍，不僅持續挖掘未獲重視的女性同行，更從性別角度分析近代史學史敘事的建構、得失與展望。❺不過，大部分的論著以英文在北美發表，討論重點則聚焦於西方史學發展。此蓋基於近代專業史學本身建立的時空背景，卻也凸顯群策群力長期關注的績效。

吾人今日所認知的現代高等教育，十九世紀於歐洲發軔，❻新興的科學史學標榜竭盡所能地開拓並蒐羅檔案，並在討論課上往復分析論辯。這種進行歷史研究和培訓後進的教研方式，很快便傳到了北美。❼不過，直至二十世紀初，美國大學中的女生仍然非常稀少，完成高等教育後加入學術機構者更是寥寥無幾。❽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AHA）於 1884 年成立，原即為推動新型態的歷史教研，但其中有些集會或明示或暗示將女性排除在外。有鑑於此，一群先驅女性在 1930 年成立了「伯克夏女性歷史學家會議」（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希望藉由組織動員的力量，增加 AHA 中的女性成員，並提升她們的地位。積極的女史家們組織委員會和研討會場次參加年會，檢視女性在史學這一行中的聘任條件和工作環境，希望彰顯女性對歷史研究的投入和貢獻。這些早期的嘗試，在 1960 年代因女權運動的推波助瀾，開始受到重視，女史家作為一種專業群體，她們

性學者，也有讀本彙整學史文獻供後來者考察。如 Lynn McDonald, *Women Founde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tricia Madoo Lengermann and Gillian Niebrugge, eds., *The Women Founder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1830-1930, A Text/Reader*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1998). 考古學界的努力亦方興未艾，近兩年連續出版研究論集，致力於發掘過去遭到忽視的前輩女性。如 Sandra L. López Varela, ed., *Women in Archaeology: Intersectionalities in Practice Worldwide*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3)，邀集 43 位女性考古學者分 29 章介紹全球五大洲女性前輩的事蹟，其中也包括一篇關於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初步調查，見 Anke Hein, Jade d'Alpoim Guedes, Kuei-chen Lin, and Mingyu Teng, “Female Schola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pp. 559-590. 又如最新的出版：Margarita Diaz-Andreu, “The Matilda effect of archaeology: recovering wome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ender Archaeology*, ed. Marianne Moen and Unn Peders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5), pp. 126-145. 各篇論文大多先挖掘女性考古學者及其貢獻，聚焦於介紹個人學研經歷，至於考古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之性別化發展史，則仍待深究。

❸ 如 Kathryn Kish Sklar (1936-), “American Female Historians in Context, 1770-1930,” *Feminist Studies* 3.1/2 (1975): 171-184. 討論詳見下。

❹ 如 Natalie Z. Davis (1928-2023), “Gender and Genre: Women as Historical Writers, 1400-1820,” in *Beyond their Sex: Learned Women of the European Past*, ed. Patricia H. Labalme (1927-2002)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3-182. 討論詳見下。

❺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應屬 Bonnie G.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❻ Ku-ming (Kevin) Chang and Alan Rocke,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Research Education: Discipline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s, 1840-1950,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Series XXXIV/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❼ Bonnie Smith, “Gender and the Practices of Scientific History: The Seminar and 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4 (1995): 1150-1176.

❽ Ku-ming (Kevin) Chang, “Femininity in Masculine Academia: Women’s Entry to the World of Disputations and Dissertation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13 年度第 19 次學術講論會 (2024.12.09).

的生活經歷、職業模式、研究環境和學術成就，益發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相關論著在1970年代以後逐漸蓬勃。<sup>14</sup>

歐美歷史學界起初亦以發掘早期女性同行為主，例如美國的Lucy Maynard Salmon（美國憲政史，1853-1927）和英國的Eileen Power（歐洲中古經濟史，1889-1940），便經常出現在女性名人傳記辭典中，亦不乏後輩景仰者為其單獨作傳。<sup>15</sup>然而，除了明星型人物之外，研究者也廣事蒐羅，不僅發掘遭忽視的隱藏型人物，更從知識建構、性別分工等角度切入，依不同時空分析女性參與歷史書寫與教研的經歷，考察女史家作為一專業群體的長時段發展。數十年來累積成果豐碩，頗值得其他地區學群探查此題參考借鑑。

本文主旨即在回顧上述英文學界對女史家的研究，特別關注群體群像而非個別傳記的發表。盡量涵蓋包括期刊論文、專書篇章和論文合集等各種出版型態，按時間順序介紹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來的著作，展示過去五十年間前輩同行在開拓此一課題上曾經採行的策略、聚焦的面向、嘗試的理論，以及具體產出的成果。全文以檢視西方史學發展者為主，唯在最末試舉幾例英文學界對中國史的研究，盼為中文學界對此課題後起直追提供靈感來源。在進入正式介紹之前，需先說明詞彙用例。本文評述的英文著作大多直稱其研究對象為 women historians 或 female historians，偶爾代換為 women historical writers，著眼於確曾參與歷史教研、著述和出版的女性，並不限於在現代學科體制高教機構內任職者。換言之，雖然中文語境中對於能「成一家之言」者期許甚高、界定亦嚴，但為介紹英文論著，本文將採較為寬鬆的用語，或直譯為女性寫史者，或通稱她們為女史家。

## 二、挖掘學科建置初期的女性：將傳記辭典和高教數據脈絡化

歷史學者最初嘗試研究女性前輩時，除了少數比較知名的史家偶有個別傳記外，其他系統性史料並不多，若欲分析女史家群像，從傳記類辭典入手，搜尋人物線索並進行整體觀察，不失為明智的作法。1975年Kathryn Kish Sklar發表於 *Feminist Studies* 的先驅性論文，正是以此出發。<sup>16</sup>她運用《知名美國女性傳記辭典》（*Notable*

<sup>14</sup> Armita Jones, "Women Historians and Women's History: An Organizational Guide," *Women's Studies Newsletter* 5.1/2 (1977): 11-13.

<sup>15</sup> 例如，Maxine Berg, *A Woman in History, Eileen Power, 1889-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 Chara Haeussler Bohan, *Go to the Sources: Lucy Maynard Salm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sup>16</sup> Sklar, "American Female Historians in Context, 1770-1930," pp. 171-184.

*American Wome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較為完整而系統性的資料，<sup>17</sup>將 Berkshire Conference 成立之前的 160 年間，共二十六位列名的美國女史家，劃分為三個時期，指出她們參與歷史書寫的時代背景各異，卻展現跨時代的共相。第一代 1800 年之前出生的女性，在殖民時期書寫歷史，通常受益於她們所處的清教徒信仰社群。1800-1850 年出生的第二代，之所以能參與史學創作，則有賴當時維多利亞文學氛圍的支持。而 1850 年後出生的第三代，親身經歷了史學專業化的過程，並在其中求進取。即使寫史的時代背景不同，三代女史家卻共同面對兩個問題：首先是以書寫謀生的需要，其次則是遭受性別歧視的經驗。Sklar 將這些女性的生活與工作納入她們的家庭與社會脈絡中討論，呈現她們透過書寫持續參與周遭世界的人生際遇，指出百多年來三代女性寫史者的堅持，女史家才可能在二十世紀上半成立自己的專業組織。

傳記辭典之外，高等教育的綜合統計數據，也為先驅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背景。1980 年 Berkshire Conference 的開幕演講，由 Joan Scott 擔綱，她便運用美國高教的數據，說明女性參與史學專業的起伏消長，分析女史家在學術領域中的前景。Scott 指出，1920 至 1930 年代，女性已佔所有教職員的 32.5%，但多集中於女子學院。二戰期間及戰後，隨著學生人數銳減及男性重返大學職場，女性佔比急劇下降。直到 1970 年代晚期，當戰後嬰兒潮的一代成長接受高等教育時，大學教師的需求量增加，女性比例才開始回升。例如，1969 年美國的歷史教職人員中女性僅佔 10%；1973 年僅佔所有取得博士學位者的 13%。但在 1974-1980 年間，比例翻倍：取得博士學位的人中，女性佔了 26%，教職人員中則佔 25%。<sup>18</sup>

然而，數據反映了政經等大環境的影響趨勢，卻無法呈現女史家的具體處境。Scott 指出，事實上，很多女博士雖然終於謀得教職，卻是受雇於預算有限、升遷機會稀少、研究資源匱乏的學院。為了更全面地評估美國女性歷史學者的生活與工作，Scott 跳脫量化數據，進一步探討女史家被接納的條件與方式。她檢視 AHA 成立一百年來，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待遇、努力與貢獻，嘗試分析學術政治和歷史寫作的交互作用與同步變化。<sup>19</sup>

根據 Scott 的觀察，二十世紀早期 AHA 中的女性成員常被視為史學界性別平等的象徵，但其實她們的人數有限，也沒有什麼機會參與決策，甚至有時遭到刻意的區隔。例如，AHA 為男會員舉辦年度聯誼活動，在吞雲吐霧之間論學，女會員則不在受邀之列，而需另闢一室，和男學者的女眷喝茶聊天。Lucy Maynard Salmon 就曾直接抗

<sup>17</sup> Notable American Wome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系列，由哈佛大學出版，至今第五輯已出齊二十世紀的人物。Sklar 運用的是 1971 年出版的前三輯。

<sup>18</sup> Joan W. Scott,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1980s,”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9.3 (1981): 23-32.

<sup>19</sup> Joan W. Scott, “American Women Historians, 1884-1984,” i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8-198.

議：不想和社會名媛喝下午茶，也反對將男女學者分成兩個階級的社交方式。此外，Salmon 不只一次表示，對於長期以來自己都是決策委員會中唯一的女性感到沮喪。Salmon 的意見和心情，在後續的研究中經常被提及，作為早期女史家困境的例證。<sup>20</sup> Scott 指出，即使女史家們持續組織遊說，在 1943 年成功推舉 Nellie Neilson（歐洲中古經濟史，1873-1947）擔任 AHA 的主席，但學會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未曾改變。直到 1970 年，AHA 才成立了常設的「女史家委員會」（Committee on Women Historians），以倡導女性權益，並監測統計數據，確保「女性作為歷史學界的學生與教師的公平地位」。<sup>21</sup>

類似 Salmon 處於樞紐位置的先驅人物，她們的大聲疾呼雖然偶有成效，但其行動常顯得個別而零星。相較之下，集體行動或許更能凸顯男女史家的機會和待遇確有差別，不過，有時也會招致批評，認為女史家是在要求特別優惠。兩種策略，孰優孰劣，是致力於提升女史家地位的學者不斷反思的課題。Salmon 曾積極參與婦女投票權運動，也是在檔案之外，推動收集並運用報紙等開創性史料進行學術分析的先驅。根據 Scott 的觀察，Salmon 那一代的女性之所以支持男女平等，是基於一種普世人權的信念對進步民主的追求。她在女子學院 Vassar College 任教時，持續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為學生牽線，鼓勵她們到其他大學進修深造。<sup>22</sup> 然而，她這些培育人才的努力，在她去世後幾遭遺忘，她對歷史研究的創新貢獻在美國史學史的敘述中也隱微不顯。直到女性的集體行動，例如 Berkshire Conference，以及更廣泛的婦女運動興起，Salmon 及其同時代女史家才受到重視。<sup>23</sup> 爾後，1990 年代相關研究蓬勃發展，學者延續上述路徑，不僅探索女性參與近代史學專業形成過程中的經歷，也嘗試考掘前近代女性寫史者對科學史學發展的影響。

Jacqueline Goggin 刊登於 AHA 會刊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的長文，便深入分析了美國科學史學建置過程中的性別議題，聚焦於 1890-1940 年間的女史家。她引用公私檔案和個人書信，細緻描述當時女性參與歷史教研的經驗。她先提供統計數據，指出這五十年間總計獲得史學博士的 334 人中，有 16% 是女性，但她們大多在高中和女子學院任教，並且在 1935 年之前沒有任何男子學院聘用女性；這與當時女子學院主要由男學者負責教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至於少數獲聘於男女合校大學的女博士，

<sup>20</sup> 例如，最早提及的有 Louise Fargo Brown, *Apostle of Democracy: The Life of Lucy Maynard Salmon*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3); 之後，Scott, “American Women Historians, 1884-1984,” pp. 183-184 曾經提及；Jacqueline Goggin, “Challenging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Women Historians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0-194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3 (1992): 769-802, 其中頁 787 也徵引了 Salmon 的提案，建議取消 AHA 中的「女士社交娛樂委員會」（Committee of Social Entertainment of the Ladies）。

<sup>21</sup> Scott, “American Women Historians, 1884-1984,” pp. 184-185.

<sup>22</sup> Goggin 徵引 Salmon 與史家同行的書信往返，說明她如何致力於支持 Vassar 的學生繼續進修深造。見 Goggin, “Challenging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pp. 779.

<sup>23</sup> Scott, “American Women Historians, 1884-1984,” pp. 187-189.

則通常是歷史系中唯一的女性，和系內男同事和校外其他女史家也因處境有別或實體遠距而顯得孤立。<sup>24</sup>

Goggin 文中也強調這些女性所面臨的教育和職涯挑戰。女學生即使優秀，仍常常爭取不到獎學金，倒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女博士卻會因結婚而失去教職。因而有些女老師，如 Mary Wilhelmine Williams（拉丁美洲史，1878-1944），便大聲疾呼應當固定開授婦女史課程，主張唯有在衆人都認知到問題之深遠複雜後，女性在整體高教中的待遇才有改善的可能。<sup>25</sup> Williams 也和 Salmon 一樣，經常協助女學生建立進修網絡、推薦她們申請獎助學金、建議 AHA 年會應給年輕女史家發表的機會，以利她們將來投稿出版。然而，當時學術期刊多由男性主編，常因偏好特定主題或寫作風格而對女史家的稿件更加嚴格審查。Goggin 指出，1895 至 1940 年間，AHA 會員中女性佔比約在 15%-20% 之間，但其會刊 *AHR* 登載的文章中，女性作者卻僅佔 3%。<sup>26</sup>

Goggin 的論文列舉各類差別待遇如何阻礙女性在近代史學專業職場上的發展，也強調集體行動的必要性，以利挑戰並改變現狀。不過，她提及的女博士中，也有經歷攔阻卻堅持不懈，在一扇窗遭關閉之後，另闢蹊徑開了一扇門的。例如，Goggin 文中所舉 Alice Kimball Smith（美國現代科學史，1907-2001），正是因結婚而被取消大學獎學金的其中一人。但若繼續考察她的人生，可以發現其研究熱忱未嘗稍減。在跟著丈夫移居 Los Alamos 之後，Alice Kimball Smith 有機會結識參與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的科學家，並獲得他們的信任，便運用她的史學訓練進行口述訪問，同時參與合編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書信集，最終出版了一部關於原子彈科學家的專書，成為美國科學史的先驅之作。<sup>27</sup>

確實，女性即使遭拒於學院之外，仍然可能繼續研究發表歷史論著。她們的努力超越專業教研機構的界限，而她們的成績，也啟發學者探尋近代史學專業形成之前已經在從事歷史寫作的女性先賢。

<sup>24</sup> Goggin, “Challenging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pp. 777-781.

<sup>25</sup> Mary Wilhelmine Williams 自己便曾在 Goucher College 開授婦女運動史長達二十年，見 Goggin, “Challenging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pp. 778.

<sup>26</sup> 這類統計和呼籲，近年仍可見於科學期刊，如 Nature Editorial, “Nature publishes too few papers from women researchers—that must change,” *Nature*, 2024.03.0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0640-5> (2025.02.05 查詢)。唯歷史或人文類學報似尚未見更新研究。不過，某一專業領域的發展初期，好不容易參與其中的女性從業者，只能在基層盤桓而難以爬升至發言的領導位置，此一現象，並不限於史學，非學術的專業領域亦可見相關研究。如李貞德，〈臺灣女性司法人員的歷史初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1 (2021)：151-242。

<sup>27</sup> Alice Kimball Smith, *A Peril and a Hope: The Scientists' Movement in America, 1945-194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實際，在英國現代科學史上也有一位類似 Smith 經歷的女學者：Margaret Gowing (1921-1998)，其史學職涯分析，可參 Laura Carter,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Precarious Professionals: Gender, Ident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Britain*, ed. Heidi Egginton and Zoë Thoma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21), pp. 263-285. 討論詳見下。

### 三、超越建制：搜尋近代學研機構之前和之外的女史家

Natalie Davis（近代早期歐洲史、性別史，1928-2023）正是挖掘女史家身影的先行者，考察範圍包括近代學科建置之前和專業機構之外的前輩。Davis 在 1980 年代便曾發表長文，追索中世紀以來數百年間參與寫史的女性，介紹從 Christine de Pisan（1364-1431）到 Germaine de Staël（1766-1817）之間的多位作者，分析她們書寫歷史的動機、經歷和成果。<sup>28</sup>

Davis 指出，前近代學識淵博的女性若想寫史，至少需滿足三個條件。首先，她必須能夠接觸到歷史資訊，不論是手稿還是口述信息，亦即，她必須參與家戶之外的活動，藉由觀察和訪談來獲取史料。其次，她必須瞭解歷史書寫的文類，熟稔組織、鋪陳和呈現歷史材料的基本原則。最後，她必須和政治或宗教等公共生活建立聯繫，因為這些領域被視為歷史書寫的合適題材，女性寫史者撰述這類課題才會獲得認真對待。<sup>29</sup>而 Davis 首位介紹的 Christine de Pisan 正符合上述條件。

拜父親服務公職之賜，Christine 自幼即悠遊於宮廷圖書館中。二十五歲夫亡守寡後，為撫孤奉母而賣文維生。她以筆鋒剛健知名，受到王室青睞，獲邀撰寫先王傳記，但當她發表政治評論時，卻因身為女性而遭質疑能力不足。Christine 面對性別歧視，決定出版專書，介紹古往今來衆多才華洋溢、道德高尚，以及信仰虔誠的女性。書中以一事蹟即一磚瓦的敘事形式，從地基、牆垣到屋頂，以女性在各行各業的諸般貢獻為建材，逐層推砌，終於建置完成一座「女性之城」。Davis 評價 1405 年出版的《女性之城》，認為作者正是透過歷史書寫反思婦女地位的演變與發展。

Christine de Pisan 的行動確為後世的靈感來源，不過各個時代的女性寫史，仍各有其背景、動機和專注的主題。Davis 指出，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迫害與政治動盪頻仍，激發女性留下紀錄，其中一類是「較小規模的宗教史」，另一類則是眼見為憑的「家族史」。此處 Davis 以“small-scale religious history”稱呼女性書寫的宗教史，包括中世紀女修道院長所作修院史和宗教改革期間天主教女性著作的地方修會史等，藉以對比男性神學家所撰、常帶有普世意涵的神學史或教會史。至於十六、十七世紀的“family history”，以上層階級如政治人物的家族經歷為對象，和二十世紀以來特別關注中下階層的家庭生活史有別。Davis 重新挖掘現代史家或忽略或摒棄的文類，考掘上層女性書寫的家族史，從性別角度補充了史學史的資料和論述。

例如，法國的胡格諾派教友（Huguenot）Charlotte Arbaleste（1550-1606），在宗教屠殺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1572）中逃過一劫，便將親身經歷記錄出版。

<sup>28</sup> Davis, “Gender and Genre: Women as Historical Writers, 1400-1820,” pp. 153-182.

<sup>29</sup> Davis, “Gender and Genre: Women as Historical Writers, 1400-1820,” pp. 154-156.

嫁給同為虔誠新教信徒的思想家之後，更持續透過旅行見聞、訪賓交談，以及書信文論等資料，為丈夫撰寫言行錄，作為教導獨子的材料，卻也因此她的家族史寫作在中年喪子之後戛然而止。英國 New Castle 的公爵夫人 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 雖無子嗣，卻是一位多產作家，戲劇、小說、詩歌、自然史等，作品豐富。她以自傳陳述出身、性格與人生經歷，也以生花妙筆為政爭流亡的丈夫作傳，留下家庭生活和參與公務的豐富紀錄。

對於寫史，Margaret Cavendish 自有定位，宣稱她撰著的既非通史也非國史，而是「獨特史」(particular history)，也就是她親歷目睹、確實知道的事情。因此她主張即使她寫的是戰爭，也不會因為身為女人而價值稍減。Davis 指出，家族史的主要內容可能大同小異，不外生老病死、婚宦學友，但男性寫史常以自身官歷作為推進敘事的主軸，女性卻多環繞著生命週期作論。而像 Arbaleste 和 Cavendish 諸位將身歷親見之事記錄鋪陳、傳諸後人的女性寫史者，她們的家族史中通常充滿細節，對當前歷史研究者亦具啟發。

至於出現於十八世紀的國家史，Davis 則舉 Catharine Macaulay (1731-1791) 為例。她因身為女性而無緣進入大學，卻著述不輟，靠筆墨為婦女受教權、出版自由、政府分權等各種政治社會議題發聲。她出版皇皇巨著英國史，挑戰 David Hume (1711-1776) 聲名大噪卻不無爭議的同名作。Davis 形容 Macaulay 批評 Hume 充滿政黨偏見，主張歷史寫作應該是客觀敘述而非主觀論斷。但或許因為對中立表述的執著，Davis 稱 Macaulay 的英國史富於事件細節但少見歷史解釋，雖然讀起來不如 Hume 的生動，卻彷如日後科學史學的專業先聲。

女性寫史常從自身出發，專業史學建制前夕的 Germaine de Staël 也不例外。出身富貴、參與沙龍文化，卻因法國大革命而流亡，在寓旅期間寫史，反思親歷目睹的波瀾政局，並嘗試以民族性格和歷史進程等角度進行詮釋，形成 Davis 所謂哲學層次的史論。不論執著細節或高言大義，這些女性在近代歷史學科建立之前，就從個人角度出發寫史，她們關注的主題、書寫的方式，或受讚譽或遭貶抑，她們的成績卻都不容忽視，而 Davis 的研究正是將她們放回史學發展的脈絡中給予適當定位。

不過，Davis 對女史家的討論，並不限於前近代者。她也考掘二十世紀上半葉和年鑑學派關係密切的法國女性知識份子，說明她們未能進入學院任職，卻以妻子、朋友、秘書、助理、文字編輯等各類身份（有時一位女性兼具幾種身份），持續協助研究，乃至發表史學論述的情形。Davis 描述她們遭遇的困境，包括家庭、學界和國家的壓制，凸顯她們的努力和貢獻，同樣是希望為她們在近代史學史的敘事中爭取一席之地。<sup>30</sup>

<sup>30</sup> Natalie Z. Davis, "Women and the World of the *Annales*," *History Workshop* 33 (1992): 121-137.

實則，Davis 對女史家的關注，遠早於上述論文刊出的年代。Bonnie Smith 超過三百頁的專著 *The Gender of History*，便曾在序言中自陳研究緣起，乃是受到 1970 年代初 Natalie Davis 演講論述女史家課題的啟發。<sup>31</sup> Davis 的論文以 Christine de Pisan 破題，結語宣稱我們這些女性寫史者，仍在持續建築女性之城，而她用以終篇的 Germaine de Staël，則正是 Smith 大作首章的核心人物。<sup>32</sup> Smith 縱論兩百多年來史學專業形成過程中女性的身影、與男史家的異同，及其性別意義，開篇便將 de Staël 的經歷，納入十八世紀女性參與公共生活、旅行訪勝、透過書信建立交遊網絡的時代脈絡中，進一步申論這些女性出版回憶錄的先驅開創性。Smith 指出，雖然她們在近代科學史學興起之際常被視為業餘之人，卻激勵了後世從個人角度書寫歷史的可能性。<sup>33</sup> 並進一步主張，沒有業餘就不成專業，彼此實為「歷史之鏡」一體的兩面。<sup>34</sup>

除了考掘史學專業建立之前獨立寫史的女性，Smith 亦踵繼 Davis 對年鑑學派女性知識份子的前瞻性分析，擴大申論科學史學大師們的妻女在近代學術研究中的角色。Smith 指出，隨著新興的史學專業強調檔案研究，以及由男學者領導的 Seminars 聲名大噪，有才華的年輕男學生渴望參加這些討論課程，並嚮往遠赴異鄉挖掘他們視為「處女地」的未知檔案。女性經常作為妻子、女兒和助手，支持這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包括搜集資料、初步整理、修改手稿、編輯論文並協助出版。雖然她們在研究過程中也曾貢獻心力，甚至提供重要見解，卻不會被視為歷史從業者，也極少獲致感謝或讚譽。尤有甚者，大師去世後，徒子徒孫編纂遺稿時，還會以刪除師母註記、還原初稿，維持「科學」風貌為榮。<sup>35</sup>

Smith 指出，早期大學女生常被評為能力不足、不適合參加深奧激辯的研討課，且不論美國的大學教授或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都普遍抱持這種觀念，以致於「竭盡所能地阻止女生獲得學位、參加課程和通過考試」。當女性奮鬥不懈終於取得教職時，多仍單身，和男學者有家眷協助不同，她們往往和女性親屬或其他職業女性共同生活。Smith 形容這些女性面臨的障礙如此之多，以至於她們「甚至不能算是第二性，應該視為第三性」，亦即將女學者當作一般認知中男人和女人之外的另一種存在。<sup>36</sup>

即便這些早期女史家大多只能取得女子學院的教職，她們仍努力前往海外蒐羅檔案，並在自己的課堂上為學生提供研討機會，甚至嘗試突破對檔案的定義和進行研

<sup>31</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p. viii.

<sup>32</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chap. 1, “The Narcotic Road to the Past,” pp. 14-36.

<sup>33</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chap. 2, “The Birth of the Amateur,” pp. 37-69.

<sup>34</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the Mirror of History,” pp. 1-13.

<sup>35</sup> 討論見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chap. 3, “What is a Historian?” pp. 70-102, 特別是其中一節 “Households and Great Historians,” pp. 83-102, 分析自然史作家 Athénaïs Michelet (1826-1899) 和丈夫法國史學家 Jules Michelet (1798-1874) 之間的合作遭後世抹殺的過程。

<sup>36</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chap. 7, “Women Professionals-A Third Sex?” pp. 185-212.

討的方式。例如，Lucy Maynard Salmon 向學生展示各類材料，不限政府檔案，也包括報紙、食譜、火車時刻表，以確保她們獲得關鍵性歷史信息，並開拓新的研究課題。<sup>37</sup> Salmon 有時也會要求學生觀察建築基址、圍欄，甚至床鋪、水槽等室內佈局。這類所謂「低階來源史料」，在今天看來，其實正是許多非文字、物質文化的研究材料，可見她的開創性。藉由考察早期女性如何在近代學科形成之前書寫歷史，以及分析男性與女性在專業教研職場中的不同經歷，Bonnie Smith 不僅突顯了女史家的貢獻，也揭示了近代史學建制過程中性別化的一面。

Smith 橫跨歐美、縱貫逾兩世紀的專書，是對歷史學科性別建構的一次整體性分析，在上世紀末出版，可謂繼往開來，後起者或再加精進，或擴大時空蒐羅論述，使二十一世紀女史家研究朝向多元發展。<sup>38</sup>

## 四、邁入二十一世紀：突破族群與國別的敘事框架

在 Bonnie Smith 出版專書的同一年，AHA 舉行了一場圓桌討論會，反思平權運動對史學教研的影響，並尋求改善美國大學中非白人女性史家的聘用與工作條件。<sup>39</sup> 相關研究遂應運而生，特別是考掘非裔女史家的論文，不僅介紹少數擁有博士頭銜者，更希望突出那些以檔案管理員、圖書館員和書目學者身份從事史學工作的人。

其中，Pero Gaglo Dagbovie 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群像分析。她採用「平行機構」(parallel institutions)的概念，<sup>40</sup> 將 19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之前的非裔女史家粗分為三組。第一組來自世紀之交、社會改革勃興的進步時代，約 1890 至 1930 年之間，非裔女性得以小說家、記者和劇作家的身份書寫歷史。她們的行動和成就，在當時雖然特殊，卻頗能與 Bonnie Smith 描述的十八世紀歐洲業餘女史家遙相呼應。第三組則是 1925 至 1955 年之間取得史學博士並在學術機構中從事教研之人。儘管這類非裔女性不過寥寥十位，卻頗能帶來見賢思齊的激勵作用。<sup>41</sup>

對讀者而言，Dagbovie 文中的第二組，或許更能彰顯「平行機構」的洞見。這些女性也有不少來自進步時代，或擔任中小學教師，或從事社會教育，或任職甚至自創

<sup>37</sup>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pp. 207-209.

<sup>38</sup> Bonnie Smith 將歐美女史家納入近代史學專業性別化的過程考察，啟發了其他地區學者的類似反思，如 Nadia Clare Smith, *A "Manly Study"? Irish Women Historians, 1868-194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sup>39</sup> Shirley J. Yee, Eileen Boris, Shirley M. Geiger, and Barbara A. Wood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AHA Roundtable, January 1998,” *NWSA Journal* 10.3, Affirmative Action Reconsidered (1998): 135-142.

<sup>40</sup> Pero Gaglo Dagbovie, “Black Women Historians from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o the Dawn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89.3 (2004): 241-261. 「平行機構」的概念，一般用於指稱為遭忽略或歧視的族群而創立的民間機構。

<sup>41</sup> Dagbovie 破題便先舉例，如六十六歲遠赴法國取得史學博士的 Anna J. Cooper (1858-1964) 和美國大學首位非裔女性歷史學博士 Marion Thompson Wright (1902-1962)。

民間機構。儘管無法進入高教學研體系，卻積極從事歷史寫作，透過著作傳記或回憶錄表現史家的技藝，並以史家自期和自視。這類人才紛繁，難以分類框限，以致於Dagbovie在註腳中提案應有第四組，介紹非歷史科系出身卻以專業推動史學發展的女性。<sup>42</sup>例如參與創建並長期負責Howard University（1867年創立的非裔族群大學）研究中心的Dorothy Burnett Porter Wesley（1905-1995）。當Porter發現那時杜威十進法對非裔研究圖資僅分為「奴隸」和「殖民」這兩類時，便重新規劃大學圖書分類系統，擴大蒐羅並典藏原始史料，以求涵蓋更多非裔族群的歷史經驗。Porter更積極編纂多本書目資料集，為非裔美國史奠定基礎。<sup>43</sup>Dagbovie指出，這些女性專業人士藉由學術出版和社會參與，不僅更加精準而全面地詮釋了美國非裔族群的歷史經驗，甚至重新定義了美國史這個領域。

對於未能進入學術機構任教卻仍以史家自況的女性而言，書寫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動，這一點和衆多在社區的女性寫史者類似，她們的知識追求和社會參與緊密交織，形成獨特的生命圖像。相隔近二十年問世的兩本自傳集和傳記論文集，都由學者編纂、經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凸顯在社區工作的女性不斷嘗試透過分析歷史、形成論述，來推進各類公共議題，另方面也反映研究者關注這些非學術殿堂中的寫史者，不願忽視她們的努力。<sup>44</sup>

與此同時，Bonnie Smith全方位和長時段的研究，引起廣大迴響，超越北美學界。她受邀在2007年漢堡舉辦的一場「性別化史學史」（Gendering Historiography）研討會中開幕演說，講稿也收入會後出版的論文合集中。<sup>45</sup>這次會議旨在檢討西方史學界以國族建構為主軸的歷史敘事，其中隱含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實作中的排他性。參會學者指出，既有研究對檔案典藏和運用的規範，以及聚焦於政治遞嬗的論述傳統，形塑了兩百年來史學史的國族框架及其典範人物。

合集中十二篇論文，分析包括美國、英國、歐陸多國（如德國、荷蘭、芬蘭、波蘭），以及土耳其的史學史。除了呼籲重視遭到邊緣化的女性經驗外，更強調女性撰寫的書信、日記和回憶錄，常被視為私人或家庭史料，而不見藏於國家或中央層級的檔案中，最終被排除在國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敘事之外，成為史學史研究缺漏的一

<sup>42</sup> Dagbovie, "Black Women Historians from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o the Dawn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 242, 257, note 12.

<sup>43</sup> Dagbovie, "Black Women Historians from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o the Dawning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pp. 242, 257, note 5.

<sup>44</sup> 兩本論文集，分別為：Eileen Boris and Nupur Chaudhuri, eds., *Voices of Women Historians: the Personal, the Political, the Profession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和 Julie A. Gallagher and Barbara Winslow, eds., *Reshaping Women's History: Voices of Nontraditional Women Historia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8)。前者為女史家自述，後者為他人撰著，其集結和出版歷程，反映學界與社運界結盟的一面。

<sup>45</sup> 會議訊息可見Ulrike Lindner,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8 (2009): 310-314. 會議論文集結出版，見Angelika Epple and Angelika Schaser, eds.,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Beyond National Canon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2009)。

環。<sup>46</sup>不論是女性主義社運人士深具歷史意識的自述與傳記，<sup>47</sup>或是放出的後宮女官追述奧圖曼帝國的皇室生活，<sup>48</sup>都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即使是十七、十八世紀信義宗虔信運動的檔案館，也多僅收錄男性信徒的文獻，以致於近代德國教會史的敘事，極度欠缺女性詮釋並反思宗教經驗的歷史紀錄與研究。<sup>49</sup>

或許正是為了檢討既有的國別史限制，也可能仍難免現行框架的影響，儘管書名標榜「超越國族典範」(beyond national canons)，合集中的文章仍多以現代國家為範圍進行分析。但也有少數跨越國界者，或綜論西歐對多元歷史文化的疑慮，<sup>50</sup>或比較德國與波蘭史學史的發展異同。<sup>51</sup>而 Bonnie Smith 的論文則明確提出「新的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並稍舉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地區的女史家及其研究為例，指出未來可以進一步開拓的方向，反映了美國史學界比較成熟的性別研究和東亞研究經驗。<sup>52</sup>

相隔十年，另外一部同樣受到 Bonnie Smith 啟發並邀請她參與其中的論文集，則在標題上直接表明將討論「學院內外」的女史家。<sup>53</sup>該集涵蓋從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十四位女性，她們參與了北美、英國和歐陸的學術網絡，但並非皆為學院中人。有些女性確實獲得博士學位、在著名大學授課，並協助她們的女學生更上層樓。例如 Ellen A. McArthur (英國社會經濟史，1862-1927)，是倫敦政經學院早期僅有的幾位女教員之一，她致力培養新秀，桃李滿天下。作者在介紹完她的生平事蹟和學術貢獻後，還在文末附錄羅列經她指導而教研有成的女學生，既作為例證，也展現傳承，並供後續擴大研究之用。<sup>54</sup>

另一類女史家，則出入學院內外，她們的研究反映了自身的時代和經歷，並且提出了至今仍具啟發性的見解。例如 Alice Clark (歐洲社會經濟史，1874-1934)，她的研

<sup>46</sup> 見合集導論，Angelika Epple and Angelika Schaser, “Multiple Histori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7-26.

<sup>47</sup> 如 Krista Cowman, “‘There is so much, and it will all be history’: Feminist Activists as Historians, the Case of British Suffrage Historiography, 1908-2007,”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141-162.

<sup>48</sup> Ruth Barzilai-Lumbroso, “Gossip or History? Popular Turkish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Ottoman Women’s History,”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117-140.

<sup>49</sup> 如 Ulrike Gleixner, “Gendering Tradition and Rewriting Church History,”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105-116.

<sup>50</sup> 論文集中，也有學者稱這類跨不出國家範圍的史學史，是對多元的恐懼，見 Maria Grever, “Fear of Plurality: Historical Culture and Historiographical Cano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45-64.

<sup>51</sup> Claudia Kraft, “Gendering the Pol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78-104.

<sup>52</sup> Bonnie Smith,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Global Age: A U.S. Perspective,” in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pp. 27-44. 文中介紹的中國女史如完顏惲珠 (1771-1833)，已有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的研究；Bonnie Smith 提到的日本女史家如中島湘煙 (1864-1901)，則有 Sharon L. Sievers, *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等論著提及。另，文中也列舉了陳衡哲 (1890-1976) 和紫式部 (973-1014) 等人，期許未來者繼續開拓東亞女史家課題。

<sup>53</sup> Hilda L. Smith and Melinda S. Zook, eds.,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Academy*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sup>54</sup> Amy Louise Erickson, “Ellen Annette McArthur: Establishing a Presence in the Academy,” in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pp. 25-48.

究計畫獲得政經學院的獎學金，擬定考察十七世紀女性的勞動營生。但她同時又參與歐戰後勤工作，並協助家族的製鞋生意，看似分身乏術的忙碌，卻幫助了她擴大視野並精進論述。她 1919 年出版的專書，分析獨立的家庭企業如何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之下，轉型為以工資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從而削弱了女性勞動營生的獨立性。此一轉變將女性貶抑為無償的家務勞動者，而外出工作的男性則變成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此外，Clark 還論證了女性不僅被排除在新興的醫學和教育專業之外，即使是在原本屬於女性的工作領域，如助產、釀酒和絲綢紡織行業中，她們的地位也逐漸下降了。Clark 的觀察和論述深刻，以致於她的著作在首發百年之後，對經濟史、醫學史和職業史中的性別課題仍具啟發。<sup>55</sup>

論文集中還討論另外一類女史家，她們雖在學院之內，所受待遇卻如外人。Ruth Benedict（人類學和亞洲文化史，1887-1948）對東亞研究貢獻卓著，卻直到去世前一年她 60 歲時才晉升為正教授。Benedict 是人類學訓練出身，因對日本文化史的開拓性研究，而被收錄在本論文集中。她的代表作《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 是二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的一項研究計畫，旨在幫助理解這個遠東國家。<sup>56</sup>另一位研究不輟卻屢遭冷遇的，是英國女史家 Isabel de Madariaga（俄國政治史，1919-2014）。她專研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分析其執政時代的行政策略和外交手段，突破過去論者著重女皇私人生活和浪漫關係的取徑。雖然 Madariaga 致力於蒐羅新檔案、提出新方法，視角和成果都具開創性，學術生涯卻持續面臨挑戰。在獲得博士學位十多年後才取得第一份正式教職，且直到退休前三年才得以出版最重要的研究成果。<sup>57</sup>

這本宣示涵蓋「學院內外」女史家的論文集，還包括傳記作家、通俗作者、文學學者、公民權利和女性主義運動家，以及在小型學院任教的歷史教師。<sup>58</sup>儘管來自不同背景，職涯軌跡也起伏有異，Bonnie Smith 却在結論一章中強而有力地總結了她們作為「女史家」此一群體的共相和挑戰：

<sup>55</sup> Tim Stretton, “Alice Clark’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n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pp. 49-71.

<sup>56</sup> Tracy Teslow, “Ruth Benedict: An Anthropologist’s Historical Writings,” in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pp. 247-272.

<sup>57</sup> Willard Sunderland, “The Historian and the Empress: Isabel de Madariaga’s Catherine the Great,” in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pp. 181-194. Madariaga 的研究在今日看來是不折不扣的女性史，且其研究不挖掘個人情愛隱私而是析論女皇的政治作為及其影響，更呼應近年女性能動性的研究取徑。但 Sunderland 文中稱 Madariaga 拒絕以性別作為歷史分析的工具，也否認女性主義對她研究設計的影響，只是一再強調所有論點皆根據史料而來，反而淡化了冷戰時期俄國管制史家運用檔案此一現象。Madariaga 的實證主義宣示是否反映她面對職涯受挫的策略，令人好奇。

<sup>58</sup> 論文集共 11 章，其他篇章還包括了持續以高中教師身份寫史的 Julia Cherry Spruill (1899-1986)，以女性主義運動家身份研究莎士比亞等文學史的 C.C. Stopes (1840-1929)，從未在大學任教卻持續書寫英國歷史普及書籍而廣受歡迎的 C.V. Wedgwood (1910-1997)，從英國移民至美國後畢生在小學院任教的 Caroline Robbins (1903-1999)，以書寫女性和藝文人物傳記而被視為女性主義者的 Arvède Barine (1840-1908)，以及同時出版政治人物傳記和浪漫小說成名的 Nancy Mitford (1904-1973) 等人。

女史家在其作品中嘗試各種體裁，運用多重史料，研究各式各樣的主題。作為一個群體，她們也在過去兩百年間逐漸從業餘者走向專業化。然而，本論文集中考察的大多數女性，並未享有男史家逐漸獲致的學術發展管道，即獲得長聘機制內的專任受薪教職。截至晚近，女性的史學參與及投入方式，仍多半以業餘路徑為主，通過寫書和發表文論來維持生計。事實上，本論文集中收錄的史家中，只有一人擁有較為常規的學術職涯，其他人或不定期在大學兼職，或比男性同儕晚了數十年才獲聘正式教職。終究而言，就如學院外的女史家一樣，許多人的生活波瀾起伏卻也饒富趣味，並面臨個人與學術生涯的嚴峻挑戰——而後者多半因為她們身為女人。<sup>59</sup>

## 五、近期成果：走出北美，放眼洲際

前述 2007 年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學術研討會雖在德國召開，主辦者最後決定以英文出版合集，即為了與此題成果較為豐碩的英文學界對話。不過，儘管北美的婦女與性別史研究依然蓬勃，近年來聚焦女史家專業群體的發表，較之過去數十年來似有趨緩之勢。所幸，延續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跨出北美的努力，最近十年陸續出現的英文論著，範圍涉及更多地區，如澳洲和巴爾幹半島，也有單論希臘者，其中不乏先以其他語文發表後再英譯以饗讀者之作。

Ann Moyal 的論文便分析了二十世紀十多位澳洲女史家，指出她們共享了出版自傳此一傳統。<sup>60</sup>這些女性皆為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她們的文化背景多元，故而經常透過回憶兒時經驗，來呈現澳洲的政治社會環境對她們成學的影響。例如，一位蘇格蘭裔的女性成為澳洲女性參政運動的先驅，另一位具猶太血統的女性因歐洲排猶危機而移民澳洲，還有一位德奧混血的女性在二戰期間逃至澳洲，初時遭到監禁，最終在一所天主教學校獲得身心安寧，而開始她的史家生涯。<sup>61</sup>這些女性大多未曾擔任高教職位，而是以活動家、記者或左派回憶錄作者的身份書寫歷史。許多人先是參與了「澳洲傳記辭典」(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的計畫，之後才決定出版自傳。此一 1956 年國家開辦的計畫，由國立澳洲大學 (ANU) 的國家傳記中心 (National Centre of Biography) 執行，自 1966 至 2021 年，已出版十九冊傳記辭典，成為個別人物和專業群體研究的入門史料。Moyal 的論文和前述 Sklar 於 1975 年出版的美國女史家研究類似，顯示全國性女性傳記計畫對於啟動女史家研究的重要性。

<sup>59</sup> Bonnie Smith, “Conclusion,” in *Generations of Women Historians*, p. 299.

<sup>60</sup> Ann Moyal, “The Female Gaze: Australian Women Historians’ Autobiographies,” in *Clio’s Lives: Biographies and Autobiographies of Historians*, ed. Doug Munro and John G. Rei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65-78.

<sup>61</sup> 這三位依序為 Catherine Helen Spence (1825-1910)、Amirah Inglis (1926-2015) 和 Helga Griffin (1935-)。

在衆多介紹北美和西歐的英文論著中，Krassimira Daskalova 在 2018 年發表針對巴爾幹半島史學史的分析是個重要的例外。<sup>62</sup> 為了批判國家社會主義史學偏向以男性為中心的敘事，Daskalova 引用克羅埃西亞歷史學家 Lydia Sklevicky（南斯拉夫性別與政治史，1952-1990）的名言：「歷史課本出現馬匹的次數比女人猶多！」雖然在 *Gendering Historiography* 合集中，學者分析波蘭國族史建構，感嘆即使到了論文發表的 2007 年，史學界的性別反思仍然非常匱乏，不過，Daskalova 認為對東歐而言，1989 年的政局變化確實曾發揮了轉捩點的作用。隨著蘇聯解體和西方學術的引進，女性史開始在東歐萌芽，只是礙於檔案運用的政治管制，具體進展仍然有限。大多數在學術機構外進行的研究，集中考察勞工階層的婦女，難以觸及女性專業人士。直到二十一世紀，女性主義才在東歐的高等教育中逐漸興起，並開始引起學界對女史家經驗的關注。<sup>63</sup>

次年，同一學術期刊登載了一篇關於十九世紀希臘女性作家的研究。<sup>64</sup> 文章探討了民族主義、女性運動與歷史書寫之間的交互作用，揭示了希臘女性作者如何撰寫、發表對過去的敘事。指出希臘早期的性別平等倡議，是被放在 1830 年獨立建國的「民族問題」中論述的，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之後，才見將焦點轉回「女性問題」本身。而參與研究的女史家們，也才將目光從公領域移向私領域，逐漸認識到個人經驗與歷史處境的交織影響。換言之，「超越國族典範」的努力，仍在持續進行，並從北美、西歐往外擴散，鼓勵研究者挖掘長期隱微不顯的女性寫史經驗，從性別視角反思主流史學史的敘事。

從早期 Natalie Davis 列舉中世紀以來的女性寫史者，到近年希臘女性歷史書寫的經驗分析，皆可見學術中人並無法免於政治動盪與社會運動的影響，而女性往往在公私領域中感受雙重衝擊。Laura Carter 關於二十世紀英國女性歷史學家的文章，正是英倫學界針對此題的最新貢獻。<sup>65</sup> 她指出，倫敦大學的女性歷史學家比例在 1930 至 1931 年達到 30% 的高峰，1976 至 1984 年間降至 17%，並在 2000 年再次回升至 30%，其間消長難免受到英國政經和社會環境變化的左右。Carter 利用《牛津國家傳記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資料，考察兩百多位女性歷史學

<sup>62</sup> Krassimira Daskalova,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in the Balkans,” *Clio: Women, Gender, History* 48, Gendering the (post-)Ottoman World (2018): 191-200.

<sup>63</sup> 二十一世紀東歐學界對性別史的研究進展，參見 Maria Bucur, “An Archipelago of Stories: Gender History in Ea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5 (2008): 1375-1389. Bucur 認為雖然推進的速度緩慢，但她保持樂觀。

<sup>64</sup> Sophie Coavoux and Regan Kramer, “Women Author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Greece,” *Clio: Women, Gender, History* 49 (2019): 221-237. *Clio. Histoire Femmes et Sociétés*，原為 1995 年在巴黎創刊的雙語半年刊，2013 年法文刊名改為 *Clio. Femmes, Genre, Histoire*，並同時以 *Clio: Women, Gender, History* 為刊名出版英文版。

<sup>65</sup> Carter,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63-285.

家，依成長年代分為三個群組，再根據她們所處的政治環境、研究場域和讀者受衆三種變項來分析她們的研究型態與工作成果。

第一群組女性於十九世紀末出生，在二十世紀初學成並進入學界。她們在新興的現代學科體系中受教育，並與既有的男性史家建立學術交流網絡。她們人數雖不多，但其中不少人共同關注中世紀或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經濟史，Eileen Power 便是其中佼佼者，她們的研究成果受到男性同儕的肯定，其學術職涯也啟發女性後輩。Carter 分析的第三群組，則出生於 1940 年後，在女性主義和社會運動的氛圍中成長求學。她們既在學院中力拚學術生涯，也參與街頭社運，而且常以女性主義的視角切入研究、著述發表，並藉此面對更廣泛的公眾閱聽人。

然而，和前述幾部跨界考掘的著作一樣，Carter 提醒讀者特別注意第二群組，指出她們是近代以來英國史學史敘事中「被遺忘的一代」。這些女性在 1930 至 1960 年間入學、畢業，並嘗試開展學術生涯，卻因家庭負擔或公共任務而中斷，許多人未能獲得高教職位。二戰期間，他們在圖書館、博物館和公家機構中，以圖書館員、檔案館員、傳記作家或期刊編輯等身份從事學研工作。不少人參與地方層級的公共事務，得以接觸相關檔案紀錄，故而對地方史和家族史產生興趣，在二十世紀中期掀起一波研究熱潮。少數曾經在中央政府部門工作者，也有人最終經由非典型途徑進入學術界，其中，牛津大學科學史第一位講座教授 Margaret Gowing (1921-1998) 便是一例。Gowing 原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二戰期間投身政府公務，戰後繼續在內閣辦公室任職。因其專長和資歷，被任命為英國原子能機構的檔案管理員和歷史學者，在長年接觸檔案資料和相關人物的環境中，她不但參與了英國官方二戰史的寫作和出版，更完成英國核能發展史的先驅性著作，因而受邀出任牛津的教席，並連獲國家獎章、學術院院士和皇家學會會士等殊榮。<sup>66</sup>

Carter 將 Gowing 的經歷和曾服公職並參與英國歐戰史料編纂的 Lillian Penson (1896-1963) 並列，<sup>67</sup> 指出這些二十世紀中期的女性歷史學者，在傳統上由男性主導

<sup>66</sup> Gowing 之外，Carter 還提供了多位這類引人入勝的例子。例如，Monica Baly (1914-1998) 原為護士，後轉而研究護理史，在 70 歲時完成博士學位，由皇家護理學院授予院士榮銜；Mavis Batey (1921-2013) 在戰爭期間擔任密碼破譯員，戰後開始研究園藝史。Joan Thirsk (1922-2013) 則先在戰時任職於英國情報機構，之後才開始從事農業史的研究與寫作；Thirsk 後來在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社會學，也在其他大學任教，成為英國首屈一指的農業史學者，並長年擔任社會經濟史重量級期刊 *Past and Present* 的編輯委員 (1956-1992)。參見 Carter,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72-274. 倫敦大學的歷史研究學院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最近將 1980 年代訪談史家的紀錄片數位化公開，Margaret Gowing 和 Joan Thirsk 的訪談皆已上傳網路可供閱聽。Gowing，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KlvtpAFGg>；Joan Thirsk，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h9\\_EdDSQ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h9_EdDSQ4)。該 Interviews with Historians 系列，見：<https://www.history.ac.uk/library-digital/ihrs-digital-collections/interviews-historians>。

<sup>67</sup> Lillian Penson 為倫敦大學現代史教授，並在 1948 年成為倫敦大學第一位女性副校長，以專研歐戰外交史聞名。雖然她在英國外交部編纂的官方檔案輯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並未掛名，但 Carter 徵引學者拼湊出她以公職身份擔任該系列的編輯助理時確具貢獻。其實，Penson 在學術生涯中的確持續關注英國的外交政策並積極參與海外教育政策，和比她晚一代的 Gowing 類似，是少數在傳統男性主導的領域中成名的女史家。見 Carter,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80-281.

的領域中進行研究、工作與教學。她們因戰爭時期的公職經驗和長期關注政策發展而得以進入這些領域，顯示女性必須透過「實用的歷史勞動」(applied historical labor)來證明自己，才能脫穎而出。而這些實務經驗所產出的史學論著，反映了對公共政策的敏感度。Carter 直言，這種敏感度卻正是學院專業歷史書寫所欠缺的。<sup>68</sup>

Carter 這篇最新的論文，可說總結呈現了五十年來女史家研究的進路和發展。她先從人物傳記辭典取材，然後依據統計數據劃分時段，再深入考察個別案例。除了呼應初期研究的取徑，更將指標人物納入時代脈絡中分析，連結個案與群像，為其他地區學界探討此題示範了可行的策略與方向。

本文回顧英文學界的女史家研究，主要著重對近代西方史學史的反思與重估。綜覽前文，可見五十年來成果豐碩。其中，Davis 的先驅研究顯示，前近代的女性寫史者主要關注政治與宗教，這些課題既對她們的生活有重大影響，又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即使如此，她們的歷史書寫仍不乏從自身經驗或家族經歷出發者，而她們對日常周遭細節的重視和描述，也與學院建置後的家族史和社會史寫作前後輝映。Smith 透過長時段分析則指出，進入近代學科體系的女性，起初亦仰賴男性教授的訓練指導，既以政府檔案為教研材料，難免偏重政治史。如 Lucy Maynard Salmon 進入美國歷史學會的敲門磚，正是她考察美國總統職權的學位論文。不過，也有不少如 Eileen Power 的英國女史家，自始即與男性師友區隔，關注中古經濟而非思想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但無論從何領域入行，隨著社會議題的推進以及對性別經驗（可能在生活中也可能在學術界）的反思，她們的視野逐漸開闊，知識興趣隨之拓展。女史家們對地方史、家庭史、社會史，以及女性史益發有感，也因此致力於開發多元史料，並嘗試以不同文類書寫歷史。重點是無論 Davis 或 Smith，兩位學者的先行研究皆嘗試探討所謂業餘與專業的關連，不論是指出學科建置前女性寫史者對後世的啟發，或現代學研機構內外女史家的分合，乃至她們與男性同儕學思經歷的異同，最終的目的，都是期望以性別角度切入，省思甚或改寫近代史學史的敘事。

## 六、他山之石：英文學界的中國女史家研究

以上回顧，正是借他山之石，以為攻錯，激勵中文學界繼續研究相關課題。然

<sup>68</sup> Carter 指出，1960 年代之後，英國政府多仰賴社會科學家提供政策建言，但在 1960 年代之前，歷史學者也有發言權。見 Carter,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81. 近年則有歷史學者在以批判性視角分析英國史家與殖民帝國的合謀之後，仍提醒專業史家應做出道德判斷、積極對公共政策等相關事務發言，勿讓社會科學家獨占鰲頭。見 Priya Satia, *Time's Monster: How History Makes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感謝《古今論衡》審查人提示史學與政治關連的最新研究成果。

而，英文學界的女史家研究，其實並未止步於西方史學史。Smith 的提案擴及全球視野，並舉中國史的研究為例，包括 Susan Mann 分析清代完顏惲珠（1771-1833）和李又寧介紹民初陳衡哲（1890-1976）。<sup>69</sup>由此可知，上世紀末以來西方漢學界對明清才女和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考察，也曾跨域引起專治歐洲近世的學者關注，並為中國史學者進一步鑽研女史家的課題提供對話的契機。

才女研究成果豐碩，雖然大多環繞女詩人作論，但偶爾也有觸及歷史書寫者。如 Mann 分析惲珠，著眼於她編纂《國朝閨秀正始集》所表現的道德權威，但以 *Precious Records* 為其書名，則正呼應惲珠所撰列女傳記《蘭閨寶錄》，彰顯盛清才女的歷史意識。<sup>70</sup> Ellen Widmer 則更積極論證，在清代以寫史屬於男性事業相對於作詩才是女性活動的潛規則下，女性寫史倍感壓力。她們既鮮少以「傳」為名進行歷史書寫，Widmer 便從女性為詩作所寫的「序」入手，呈現她們如何透過被容許的文類突破寫史的限制。她特別分析江南才女汪端（1793-1838）編纂的《明三十家詩選》，指出其以長篇序文介紹各篇作者的生平事蹟，較之惲珠簡介閨秀詩人的短序，表現出更強的寫史意圖。而汪端選輯全為男性詩人，以女性身份書寫男性的生命史，更是江南才女編纂詩集活動中的特例。<sup>71</sup> Widmer 致力蒐羅先行女史家，也跨出江南藝文圈，介紹廣東才女李晚芳（1691-1769）對《史記》的評述，說明在以史論陽剛對照詩歌陰柔的氛圍中，寫史女性確屬鳳毛麟角，且不易超越地區格局，無法如惲珠等江南女詩人形成跨域網絡，也難以連結全國文人社群，留下對於歷史詮釋的一家之言。<sup>72</sup> 然而，女性寫史不絕如縷，清末外交變革中，因緣際會得以參訪各方的女性，也把握機會，透過撰寫遊記，介紹其他國家的社會文化史。<sup>73</sup> 女性知書能文、參與著述的歷史如此悠久，乃至薛紹徽（1866-1911）以之反駁梁啟超為倡議新民而稱二萬萬女子皆在黑暗之中；錢南秀（中國文學與性別史，1947-2022）深入考察這位福建才女，指出薛紹徽身處西力東漸，風氣大開的婚姻、家庭與社會環境中，即使未曾出國，仍能藉由口述改寫，參與了《外國列女傳》的中文編譯。<sup>74</sup>

<sup>69</sup> 以完顏惲珠為例分析盛清才女詩選及其思想，討論見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chap. 4, “Writing,” pp. 76-120. 李又寧英譯陳衡哲文論兩篇並簡介，收入 Li Yu-ning, ed., *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Inc., 1992), pp. 59-71, 129-132.

<sup>70</sup> 胡曉真，〈「皇清盛世」與名媛閭道——評介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 (1998) : 247-258。

<sup>71</sup> Ellen Widmer, “Women as Biographers in Mid-Qing Jiangnan,” in *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 ed. Joan Judge and Hu Y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46-261, 339-342.

<sup>72</sup> Ellen Widmer, “Guangdong’s Talented Wome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 ed. Maghield van Crevel, Tian Yuan Tan, and Michel Hockx (Leiden: Brill, 2009), pp. 293-309.

<sup>73</sup> Widmer 分析單士釐（1863-1945）即為一例。見 Ellen Widmer, “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 Shan Shili’s *Guimao lüxing ji*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4 (2006): 763-791.

<sup>74</sup> Nanxiu Qian (錢南秀, 1947-2022),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不過，上述初嚐近代化滋味的才女，還未及參與史學專業機構的設立。近代高教體系及其學科建置，在十九世紀末引入東亞，號稱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教授的陳衡哲，是留學美國，接受新式史學教育的跨時代女性。她在 Vassar College 就讀時，正是 Lucy Maynard Salmon 教研生涯的高峰期。陳衡哲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經胡適引薦至北京大學教授西洋史，並出版專著。她的學涯人生新穎吸睛，自上世紀中葉以降固不乏中文簡介短評，近二十年更出現不少英文論著，或將她列入清末民初庚子賠款的留學生討論，或稱她為西化的中國女性主義者，或作為現代中國自傳作者之例探究，或放在民初藝文社團寫作風格中分析，或在考察百年來中國的世界史教研時提及，乃至視為知識傳播文化衝擊的個案以專書論述。<sup>75</sup>

陳衡哲的相關研究衆多，正因其為「第一位」女教授之故。然而，她在北大執教未久，即因懷孕生產而請長假並離職，胡適為此頗傷腦筋，擔心未來更難舉薦女學者。其實，與陳衡哲同時代或稍晚一兩代的知識女性，亦不乏出入學院內外者，她們雖然並非「第一位」，不一定屬明星型人物，有時也未必歷史本科出身，卻或堅持或斷續參與歷史教研和出版。她們和第一位女教授有何異同之處？面臨什麼共同的挑戰嗎？性別在其中又產生了什麼影響力？截至目前，英文學界針對中國史學建置初期的女史家，不論人物發掘或學思歷程介紹，還待補強，遑論將她們放在現代中國史學史的敘事中，和前代才女相提並論，如 Davis 和 Smith 考察西方史學一般，從性別角度，綜覽群體群像，探究其中延續和斷裂的歷史發展。這部分的研究，正有待中文學界進一步精進。<sup>76</sup>

<sup>75</sup> 陳衡哲作為留美學生的討論，本世紀初就有兩本著作以專節介紹，如 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4, “The Women’s Story, 1880s-1920s,” pp. 114-152, 其中特設一節談陳衡哲，見 “Chen Hengzhe: To Create One’s Destiny,” pp. 146-152. 又如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4), 也有專節討論，見 “Chen Hengzhe: the First Chinese Woman University Professor,” pp. 200-212; 此外在介紹其夫任鴻雋（1886-1961）時也多次提及。至於稱陳衡哲為西化的中國女性主義，見 Katrina Gulliver, “Sophia Chen Zen and Westernized Chinese Feminism,”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4.2 (2008): 258-274. 從自傳作者的角度討論，較早者見 Janet Ng,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Chinese Autobiography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chap. 1, “A New Strategy for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Chen Hengzhe’s Writing of Aurality,” pp. 21-39. 近年又有單篇論文，Tieniu Che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Woman’ in Chen Hengzhe’s Autobiography,”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3.12 (2013): 739-756. 關於民初藝文社團的討論，見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3); 至於以陳衡哲為例分析中國認知的世界史，討論見 Xin Fan,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 2, “Cultural Destiny: Nationalism and World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pp. 50-85. 作為科學知識傳播文化衝擊的個案，以專書討論陳衡哲者，如 Denise Gimpel, *Chen Hengzhe: A Life Between Orthodoxies*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5).

<sup>76</sup> 臺灣有關陳衡哲的專文介紹，較早者如陳怡伶，〈新知識女性的生命抉擇：陳衡哲的前半生（1890-1936）〉（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0），最近的學位論文則已可見群像分析的努力，如李姍琪，〈近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出現及發展（1920s-1940s）〉（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4），其中特舉張肖松、蘇雪林和曾祥和三人為例進行比較。

## 七、結語

女性無論在學術機構內外，皆曾投入歷史寫作。在近代科學史學興起之前，女性以作家、傳記作者和宗教奉獻者的身份書寫歷史。隨著史學成為建置化的專業學科，女性繼續以學研機構的研究員、教授、老師、圖書館員、檔案館員、書目和辭典編輯，以及大眾作家的身份研究歷史，並透過期刊、專書、文獻彙輯等形式發表她們對過去的理解和詮釋。英文學界對西方女史家的研究卓然有成，從性別角度重新省思近代以來史學史的敘事，對中國女史家的考掘也初步展開。中文學界以他山之石攻錯，針對此題更有揮灑與精進的空間。

上世紀末以來，中文學界的才女研究亦蓬勃發展，佳作備出。<sup>77</sup>學者也曾討論女性寫史如李晚芳者，或放在才德相輝的女教脈絡，或從知識傳播的書籍史角度分析。<sup>78</sup>更有在前人考著的基礎上廣事蒐羅，或表列自班昭以降女性寫史的紀錄，或挖掘明清女性透過詩歌寫史的策略，或分傳記、注疏、考證、史評、遊記等多個類別討論才女的寫史經驗及其成果，致力彰顯女性與傳統中國史學的關係。<sup>79</sup>

二十世紀初，隨著現代學術體系在中國確立，少數女性開始參與專業史學的修習、撰述和教研，是整體史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部分才華出衆的女性，或僅僅出現在私人回憶文集中、或偶爾著錄於相關領域的簡介裡，仍甚少在專業史學發展史中獲得充分討論與評價。數十年來，提及陳衡哲的文章不勝枚舉，但也不外從留美學生、自傳作者、藝文才女、或中國第一位女教授等事蹟介紹，或述奇或略說，篇幅概短而深論者寡。所幸，本世紀初開始，已稍可見考察其西洋史著作及史學思想的論文，<sup>80</sup>也偶爾有學者將她和一兩位同時代的知識女性，放在大時代的變局中推敲其性別意義。<sup>81</sup>然而，更多女性參與史學專業的起心動念、學習歷程和教研成績，其

<sup>77</sup> 如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以及作者一系列相關論著，透過研究女性彈詞小說改寫清代文學史。

<sup>78</sup> 女教分析，如劉詠聰，《才德相輝：中國女性的治學與課子》（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299-323。書籍史的討論，見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55（2015）：173-217。

<sup>79</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1957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增訂新版），是學者初入此題的重要文獻輯。劉詠聰便進一步表列班昭以降女性寫史者，又蒐羅題為讀史、詠史的明清女性詩作將近兩百首，呈現傳統中國女性參與寫史不絕如縷。見劉詠聰，《才德相輝》中的兩章：〈女性與中國史學〉，頁7-23，和〈明清女性的史著〉，頁24-77。

<sup>80</sup> 如閔凡祥，〈陳衡哲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7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53-166；王豔娟，〈陳衡哲與「西洋史」創作——以《西洋史》為對象考察陳衡哲的史學成就與思想〉，《人文論叢》2008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688-701。

<sup>81</sup> 如夏一雪，〈現代知識女性的角色困境與突破策略——以陳衡哲、袁昌英、林徽因為例〉，《婦女研究論叢》2010.4：80-86；或如晚近，王曉慧、張可，〈清華留美專科女生的生命歷程與性別塑造——以陳衡哲、顏雅清、凌淑浩為例〉，《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22.5：77-89。

實仍少見納入制度與社會的脈絡中分析。整體而言，群像層次的系統性研究，尚未開展，而女史家的知識實踐，仍是現代中國史學史敘事中隱微不顯的片段。<sup>82</sup>

有鑑於此，中研院史語所在 2024 年秋舉辦了名為「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的小型工作坊，邀集來自歐亞各國和臺灣本地的學者，針對英、法、德、捷克、印度、日、韓和中國等地，選擇一位或數位在近代史學建置前後百年間曾經參與歷史教研、發表和推廣的女性，加以介紹並分析。中國史部分有三篇論文，分別考察了同為中央大學出身而職涯人生大異的曾昭燏、游壽（1906-1994）與曾祥和（1920-2013）。<sup>83</sup>遺憾的是，雖然盡力籌劃，卻仍未能邀到討論臺灣女史家的文章，究其原因，除了現代高教體系在臺灣發展較晚之外，也由於學界對女史家的研究仍待開拓之故。

殖民解嚴、政策興革、社會運動，都可能影響女性進入高教體系或學研機構的機會。將女史家視為一個專業群體進行考察，既可理解世代差異，也能觀察長期發展趨勢。不過，這類研究往往需要更完整的高教和專業統計數據。本文的回顧也顯示，國家層級的傳記資料庫既能作為切入此題的起始點，也能提供深究個案的線索，有助於進一步的群像分析。而這些女史家研究的基礎設施目前在臺灣仍待建立。

在臺灣百年來的高等教育經驗中，直到 1960 年代，女生人數才接近文科學生總額的一半，<sup>84</sup>而在 1980 年代以前，歷史系的常態是女學生多而女教授少。<sup>85</sup>儘管研究者積極發掘公私典藏史料，試圖重建 1980 年代民主運動和婦女運動蓬勃發展之前，女性歷史學者的生命歷程和學術貢獻，不過，能辨識出的人物寥寥無幾。例如，1960 年之前，僅有一位女性曾短暫受聘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sup>86</sup>而在 1960 年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僅刊載過一篇由女性撰寫的史學論文，作者是戰

<sup>82</sup> 例如，綜論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的通俗著作，常將林徽因（1904-1955）和曾昭燏（1909-1964）等著名女學者納入其中。兩人雖非專業史家，卻都曾參與歷史書寫和推廣，但以性別角度分析兩人之著作，則不多見。林徽因部分如上註夏一雪文，曾昭燏較早的介紹，如李又寧，〈曾昭燏（1909-1964）——我國最傑出的女性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學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993）：35-48。

<sup>83</sup> 三篇論文的作者分別是戴麗娟、鄭雅如和游鑑明，三位的部分論點，以及工作坊的整體介紹，見施厚羽，〈「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1860-1960 早期女性史家工作坊」紀要〉，《古今論衡》43（2024）：89-101。

<sup>84</sup> 見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DB5&s=B19AF3B0B4D7BFAC](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DB5&s=B19AF3B0B4D7BFAC)（2025.06.10 查詢）。

<sup>85</sup> 根據 1982 年臺大歷史系的教師名錄，專任教師 36 人中，僅鮑家麟、劉翠溶、張秀蓉和林維紅 4 位為女性，兼任和客座教師 8 人中，女性僅曾祥和一人，與今日臺大歷史系專任教師 26 人中，正好半數 13 位為女性，不可同日而語。臺大歷史系官網：[https://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members\\_fulltime.html](https://homepage.ntu.edu.tw/~history/c_members_fulltime.html)（2025.06.10 查詢）。

<sup>86</sup> 周婉窈發掘介紹的張美惠即為一珍貴案例。張美惠在日治末期進入臺北帝國大學專攻歷史，至戰後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她曾獲聘教職，在 1950 年代鑽研今日吾人視為臺灣海洋史的課題，卻在短暫工作後，放棄史家專業，移民西班牙。見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臺大歷史學報》61（2018）：17-95。

後由中國遷臺的年輕學者。<sup>87</sup>而這兩位女性都在學術職涯的初期即離開臺灣和歷史學界，轉往歐洲，未能參與本地史學的發展。

女性史研究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益見蓬勃，專業史研究也不時將女性的勞動和公共參與納入考量，近年來臺灣史學界更有一股關注知識史的熱潮，然而這三個領域交集的女史家研究，在臺灣仍顯荒蕪。女性在蒐集、分析和生產歷史知識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仍有待深究。在史學逐漸成為現代學科的過程中，不論身處學研機構之內或之外，女性皆曾持續閱讀和書寫歷史，然而她們的知識實踐常被視為例外，尚未納入史學專業發展史的脈絡中系統性分析。在能全面探討群像之前，或需先處理幾個問題：個別女性參與歷史知識生產的動機如何？她們如何與其他學者（無論性別）以及所處的學術社群互動？她們的學術成果，乃至她們以寫史者存在的事實，對同時代及後世的同行有何意義？藉由釐清上述問題，學界或能重新思考女性如何在性別與知識體系的交織中，建立獨特且值得重估的史學史位置。

為了更全面理解歷史學作為現代學科在臺灣的發展過程，有必要開拓各種研究路徑。早期的量化資料恐怕不易完整恢復，但目前已有部分女史家口述訪談出版，傳記性資料庫也正建置中，皆可為未來研究奠定基礎。<sup>88</sup>在此背景下，辨識早期女性歷史學者、深入考察其著述內容，並重新評估她們在臺灣歷史學制度化過程中的地位與貢獻，成為當務之急。此外，亦不妨關注那些在近代早期被譽為「才女」的女性書寫者，檢視她們是否曾經透過詩文創作涉入歷史書寫等活動。或許我們也能擴展視野，一窺那些存在於「平行機構」中的女性，推敲她們的歷史知識實踐——包括非正規教育體系、報刊媒體、家庭教育、宗教團體等場域——其中可能蘊含尚未被挖掘的歷史敘述與知識樣態。在當今人文研究、多元價值受到強烈挑戰的世局中，臺灣似乎更應該急起直追，嘗試建立一部包含性別視角的臺灣史學發展史。

<sup>87</sup> 該論文為：楊景鶴，〈方相氏與大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1960）：123-165。史語所檔案館典藏資料顯示，楊景鶴在發表此文後不久，即申請赴法深造，卻改變專業，且未再回臺灣或史語所工作。除楊景鶴外，1960年以前在《史語所集刊》發表論文的女學者，僅有兩位外國語言學家，分別為 Mary R. Haas (1910-1996) 和 Eugenie J.A. Henderson (1914-1989) 在 1958 和 1959 年發表。

<sup>88</sup> 近年口述訪談，如王文霞、蘇梅芳、張念華訪問，陳子鶚紀錄，《黃葉辭枝，不朽永生：吳振芝教授口述歷史》（臺北：稻香出版社，2011），以及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女性群體的簡傳，如 2006 年首發的《女人履痕》，至 2022 年已出版第四冊，最初由女書文化和文化總會籌劃執行，後則由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負責。最近一本女性前輩的口訪紀錄，亦涉及多位知識人，見許雪姬訪問，林建廷、吳美慧、丘慧君、徐紹綱記錄，《查某官個代誌：耄耋女性的人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4）。唯此口訪合集與《女人履痕》一樣，都尚未涉及女性寫史者。又，中研院近史所「近代婦女傳記資料庫」包括部分清代臺灣女性，而「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 則包括部分知名女性，其中是否有參與歷史教研與著述之女性，值得再探。